

南方與蠻荒

——以中村地平的《台灣小說集》為中心

邱雅芳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研究生

中文摘要

中村地平（1908～1963）在他的《台灣小說集》後記寫下這樣一段文字：「對於南方的鄉愁、南方的憧憬、南方的愛戀，是我一生永不改變的事。」讓他投入情感的「南方」，無疑是在指涉台灣。中村對南方／台灣的鄉愁，不僅懷抱著蠻荒時代的野性憧憬，也蘊含了濃烈的浪漫主義。然而，一九三〇年的霧社事件，衝擊了中村的南方憧憬。一九三九（昭和十四）年以降的創作，中村開始嘗試以小說來詮釋殖民地的歷史，他的南方想像也逐漸和日本帝國主義的南進政策有巧妙的結合。從嚮往南方的蠻荒未開化，到強調南方的蠻荒待開化，南方作為一個概念，其實是一種政治無意識（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的表徵。以日本為中心的地理觀，形塑了中村的南方想像。中村地平的南方文學，也成為帝國書寫的一環，無形中展開了認識南方的知識論。南方象徵與日本地理相對的蠻荒位置，南方是有待被文明開發的區域。在中村的台灣相關作品中，南方與蠻荒，變成可以互相指涉的對象。

關鍵詞：南方 蠻荒 現代性 野性 中村地平 南進政策

South and Wilderness: A Case Study of Nakamura Jihei's “Collection of Taiwan Stories”

Ya-Fang Chiu

Graduate Student, Ph. D Program,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e afterword of his “Collection of Taiwan Stories”, Nakamura Jihei(1908-1963)wrote down a statement as follows: “My nostalgia, aspiration, and love for Taiwan, are the unalterable career of my life.” The “south” as expressed in his short stories written during the late 1930’s and early 1940’s is undoubtedly a metaphor of Taiwan which, for him, betrayed a message as high implication of “wilderness” and “barrenness” .Since the “Wu-She Incident” in 1930, a historical event during which the aboriginal Tayal tribe had suffered from an unprecedented genocide under Japanese merciless military attack, Nakamura had begun to try to interpret colonial history with his fiction writings which implicitly supported the “Southward Advance Policy” bolstered by Japanese imperialism. “South” as a concept in his literary writings during this period was actually a representation of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In his Japan-centrist geopolitical perspectives, it is discernible that the “south” as wilderness was no more a place for mere aspiration, but a place for further cultivation. This subtle move as reflected in his fictions was accompanied by the progress of the Advance Policy in the 1940’s. “South” and “wilderness” thus become a pair of mutually referential metaphors which can be seen as a paradigm of imperial texts produced when war was reaching its apex.

KEY WORDS : south barrenness modernity wilderness Nakamura Jihei
Southward Advance Policy

南方與蠻荒

——以中村地平的《台灣小說集》為中心

一、前言

中村地平（1908～1963）從少年時代就對南方懷有強烈的憧憬¹，在閱讀佐藤春夫（1892～1964）以台灣為題材的小說〈女誠扇綺譚〉、〈旅人〉等作品的啟發之後，驅使他立下南方之行的志向²。一九二六（大正十五）年四月，中村到台北就讀總督府高等學校，在殖民地度過四年的高校生活，終於得以親近南方風土。高校畢業後，他返日進入東大文學部美術史科專攻美學。後來拜井伏鱒二為師，以作家為專職。昭和十四年（一九三九）二月底，他為了收集小說材料再度來到台灣，在一個月的殖民地之旅當中，蒐集到不少寫作的題材。一

¹ 中村地平，〈三等旅客〉，《仕事机》，頁108；這篇隨筆是描寫作者初次踏上旅途前往台灣，在船上無意間遇到同鄉與一位友善的年輕女性，和他們展開對話的經過。中村地平（1908～1963），原名中村治兵衛，日本九州宮崎市人。中村地平從小就對南方懷有強烈的憧憬，受到佐藤春夫的台灣相關作品之啟發，讓他產生了前往南方的動力。中村的文學活動大多集中在戰前，創作以小說為主，也有一些雜文隨筆發表。他的作品主題，是以故鄉宮崎或台灣的事物居多。重要著作有《台灣小說集》，此書收錄他在1941年之前和台灣有關的短篇創作。此外在1971年日本方面還出版了《中村地平全集》（共三卷，東京：皆美社）。

² 佐藤春夫（1892～1964），日本和歌山縣新宮市人。慶應大學中退。他是日本近代有名的詩人、小說家、評論家，與谷崎潤一郎、芥川龍之介同為大正時期相當活躍的作家。在日本近代文學史上，佐藤春夫屬於耽美派作家，他的成名作是〈田園の憂鬱〉（《文藝雜誌》，1916（大正5）年11月號）與〈都會の憂鬱〉（《婦女公論》，1922（大正11）年1月號）這兩篇作品。至於佐藤春夫的旅台經過，他終生只來過台灣一次，時間是1920（大正9）年6月底至10月中旬。由於此行受到官方的款待，佐藤春夫得以暢遊台灣各地。在返回日本後，從1921（大正10）年到1937（昭和12）年之間，他陸續發表了十二篇與這次旅行相關的作品，體裁包括了小說、遊記與散文。這些文章的取材，多半來自佐藤春夫的旅行體驗，具有紀行文的性質。佐藤春夫的台灣相關作品，已由研究者邱若山翻譯並且出版，請參閱佐藤春夫著，邱若山譯，《殖民地之旅》（台北：草根文化，2002年9月）。

九四一（昭和十六）年所發行的《台灣小說集》，共收錄九篇台灣相關書寫的作品，就是兩次來台體驗的成果³。

在這本小說集裡，有多至六篇的蕃人書寫，頗為鮮明地呈現出作者對原住民主題的偏愛，尤其是原住民女性的素描。其中，創作於一九三九（昭和十四）年的〈霧之蕃社〉更是第一篇直接以霧社事件為主體的小說。而早在一九三二（昭和七）年發表的處女作〈熱帶柳的種子〉亦收入此書，是以台北風情與漢人少女為主題的小說，這篇作品因為得到佐藤春夫的讚賞，從此開啟與他知遇的契機⁴。小說集的最後一篇文章〈廢港〉，則是他追隨佐藤的台灣相關作品〈女誠扇綺譚〉而完成的作品，可以說是直接接受佐藤的影響，採取「荒廢美」的意象來呈現台灣的系譜之作⁵。

中村地平的台灣書寫，被形容為像牧歌般的作品，在〈熱帶柳的種子〉一作尤其鮮明⁶。沉浸在濃郁的亞熱帶空氣裡，作者似乎強烈感受到原始時代的素樸美感，因此帶有地域性特色的植物、氣候、景物、人種，也成為他熱衷書寫的主題。在《台灣小說集》的後記，作者寫下這樣一段文字：「對於南方的鄉愁、南方的憧憬、南方的愛戀，是我一生永不改變的事。」⁷讓他投入情感的「南方」，無疑是在指涉台灣。中村不只一次表示，他的南方之行與台灣書寫，都得自佐藤春夫的啟發。而另一位法國作家莫泊桑（1850~1893），也是他的

³ 《台灣小說集》（東京：墨水書房，1941年9月）所收錄的九篇作品為：〈霧の蕃社〉（霧之蕃社）、〈蕃人の娘〉（蕃人姑娘）、〈人類創世〉（人類創世）、〈旅さきにて〉（在旅次中）、〈太陽の眼〉（太陽之眼）、〈熱帶柳の種子〉（熱帶柳的種子）、〈太陽征伐〉（太陽征伐）、〈蕃界の女〉（蕃界之女）、〈廢れた港〉（廢港）。

⁴ 中村地平，〈解說〉，《陽なた丘の少女》（京都：人文書院，1940（昭和15）年12月），頁281。

⁵ 關於佐藤春夫以「荒廢美」意象來呈現台灣景物的探討，以及對來台日人作家的影響，請參閱筆者另一篇論文，〈荒廢美的系譜——試探佐藤春夫「女誠扇綺譚」與西川滿「赤炭記」〉，《文學與社會學術研討會：2004青年文學會議論文集》（台南市：國家台灣文學館，2004年12月），頁139-164。

⁶ 淺見淵，〈解說〉，中村地平，《中村地平全集》（第1卷）（東京：皆美社，1971年2月），頁477。

⁷ 中村地平，〈後記〉，《台灣小說集》（東京：墨水書房，1941（昭和16）年9月）。本文引用之復刻本係由河原功監修，《台灣小說集》，（日本殖民地文學精選集17；〔台灣編8〕）（東京都：ゆまに書房，2000年9月），頁273。本文稍後引用此書，將直接於引文後附加頁數，不再重複註明出處。

作品中經常被提及的詩人，是指引他在南方想像上的重要人物⁸。因私人情感問題來台散心的佐藤春夫，以及為了治癒病痛而不斷前往非洲與南歐旅行的莫泊桑，他們兩人的南方行旅，都對中村產生莫大的魅惑。就中村而言，莫泊桑的南方營造了印象式的情感，而佐藤春夫的殖民地之旅則提供一個實踐南方體驗的模式。

受到人類學者森丑之助（1877～1926）的台灣旅行導覽⁹，佐藤相當偏愛島嶼南部與原始部落的異國情調，他的台灣書寫在無形中也成為中村在殖民地旅行的手冊。然而，這樣一份指標性的導覽工具，極有可能影響了中村觀看台灣的視角。雖然高校時期在台北居住了四年，但是經由《台灣小說集》的出版不難發現，它和佐藤的台灣相關作品有類似之處。原住民主題在他們倆人的作品中一再出現，這亦和原始風情含有濃厚的異國情調的關係。

中村在高校年代首度接觸台灣風土，他的台灣初體驗帶有青春期的浪漫情懷。第二次來台，中村已經成為小有名氣的作家。循著佐藤旅台的足跡，他也受到殖民政府的特別禮遇，並且得到官員和人類學者的協助，而採訪到許多官方觀點與人類學觀點的原住民史料。蒐集這些資料是中村此行的最大目的，《台灣小說集》中的蕃人書寫，以及描寫牡丹社事件的長篇小說《長耳國漂流記》¹⁰，多集中在一九三九（昭和十四）年以後發表，從這一點來看，中村第二度訪台確實展現了具體的成果。《台灣小說集》所傳達出來的台灣意象，無形中也散發強烈的原始氛圍。

⁸ 在《台灣小說集》當中，中村地平經常引用這位作家的話。莫泊桑（Guy De Maupassant, 1850～1893），法國自然主義小說家，出生於法國西北部諾曼地。莫泊桑留下的作品有多部長篇，遊記與戲劇等，並完成了三百多篇精彩的短篇小說，被譽為「短篇小說之王」。莫泊桑在作品中對社會有細密的觀察，他習慣以冷靜客觀的筆調來描寫人性的醜惡與真實面。晚期的莫泊桑受困於精神問題，寫作的內容也因此偏向奇幻詭譎，他最後因為自殺未遂而被送往巴黎郊區的一所精神病院，於1893年死於當地。著名的短篇小說「脂肪球」，是莫泊桑最為人熟知的一部經典名著。關於莫泊桑的生平與創作介紹，可參閱高爾德著，蕾蒙譯，《莫泊桑傳》（台北：志文出版社，1976年）。

⁹ 森丑之助（1877～1926），日本京都市人。1895（明治28）年以陸軍通譯的身分來到台灣，在他隨軍隊移防台灣各地的同時，他開始接觸台灣的原住民社會，引發他研究台灣「蕃地」與「蕃人」的興趣。關於森丑之助在台田野調查活動，可參閱森丑之助著，楊南郡譯，《生蕃行腳》（台北：遠流，2000年）。

¹⁰ 中村地平，《長耳國漂流記》（東京：河出書房，1941年6月）。

誠然，中村對南方／台灣的鄉愁，其實是懷抱著蠻荒時代的野性憧憬，以及蘊含了濃烈的浪漫主義。他的觀察視域，也聚焦在台灣原住民的種族想像。透過題材的選擇，更具體展現在他的台灣書寫之上。他曾經說過：「台灣是南進之人的慰安之地」，甚至提出將整個台灣設為國家公園的構想¹¹。對來自殖民母國的日本人來說，台灣是一個亞熱帶的殖民地島嶼，極能發揮樂園的作用以撫慰旅者的身心。這是厭倦文明的近代人想回歸蠻荒的渴望，或者是呼應日本南進的開發政策而提出的想法？透過中村的台灣書寫，不僅展現近代人的文化視域，也帶出了帝國的視線。文明與野性的相剋與否，是他在作品中不斷辯證的問題。因此，本文試圖以《台灣小說集》為中心，探討中村的台灣種族想像，並重新詮釋他的南方憧憬。

二、南方的旅行

一九二六（大正十五）年四月，中村地平如願從日本渡海來到台灣讀書。這段青春時期的台灣經驗，無疑為他留下難以磨滅的回憶。他在一九四一（昭和十六）年所出版的隨筆評論集《工作桌》，有兩篇文章〈往南方的船〉、〈三等船客〉，談到初次赴台的青澀心情¹²。〈往南方的船〉是描寫作者十八歲那年，要從故鄉前往門司搭船往台的經過，除了沿途的瑣碎情節之外，也述說了作者出發前忐忑不安的心情。不過，這篇散文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在於它細膩地傳達出親情的強度。儘管父母極力支持中村的決定，然而隨著啟程日期的漸近，關於自己單獨旅行這件事，還是讓他萌生極大的危機感：「去台灣的話，說不定我會罹患瘧疾而死。這樣的話，去好嗎？」（頁 96）對於日本人來說，早期來台的旅遊活動確實帶有「探險」的意味，但是到了一九二〇年代以降，台灣已逐漸邁向現代化，「探險」活動逐漸轉向旅行與觀光的性質，這也和殖民政權的

¹¹ 中村地平，〈旅びとの眼——作家の觀た台灣〉，《台灣時報》，1939（昭和 14）年 5 月號，頁 63。

¹² 中村地平，〈南方への船〉、〈三等船客〉，《仕事机》（東京：筑摩書房，1941（昭和 16）年 3 月），頁 93-103、頁 103-115。

穩定有密切關聯¹³。對兒子遠行似乎信心滿滿的父親，卻在中村即將出發前，向他表示要親自送行到門司。他的這番舉動，其實是為了安撫中村神經緊繃的情緒。

父子兩人從故鄉宮崎坐汽車到門司，然後在客棧過夜等待隔天的船期。在用完晚餐的時刻，鄰室的一位房客突然來拜訪他們。這一位客氣的老人，也是要搭船前往台灣，因此過來打聲招呼。當彼此開始閒聊之後，才發現老先生是因為兒子在台灣病死，所以此行是要去接回他的骨灰。作者的父親在聆聽之際，神情似乎顯得相當狼狽。在老人告辭後，他語重心長地對兒子建議，如果想打退堂鼓也無所謂，就再一起回家吧。少年的自尊心，讓他隱忍住內心強烈想和父親回頭的渴望。隔天早晨，他們坐上小艇去轉搭輪船，這也是送行的最後一程。登上大船之後，距離啟航還有一些時間。神經衰弱的中村，這時身體狀況開始出現不適。父親急忙為他安排座位、買飲料解熱，並細心叮嚀他在台灣可以去洗溫泉來保養身體，學校放長假時也可以返鄉……。忽然，開船的信號響起了。當父親再度坐上小艇返回碼頭時，作者企圖透過小小的船窗搜索父親的身影。然而小艇上擠滿了送行人，隨著漸行漸遠，他再也分不清誰的臉。回到座位躺下後，他的眼睛彷彿一直在追尋父親的背影。

原本嚴厲的父親，在這裡卻展現了異於往常的柔軟身段。父親的愛子之情，隨著〈往南方的船〉的文字不斷地滲透出來。中村地平在文中提到是佐藤春夫的文學讓他對南方產生強烈的憧憬，但是透過書寫的脈絡不難看出他對南方／台灣還是存有疑慮。對於來自文明世界的旅人而言，亞熱帶縱使風情萬種，卻也難抵風土疾病的威脅。青澀少年的中村，當時即有神經衰弱的傾向。面對無法確定的未來，他的步伐顯得有些躊躇。中村在另一篇隨筆〈三等船客〉，描寫了上船後的際遇。〈三等船客〉可說是〈往南方的船〉的續篇，作者在開頭延續了〈往南方的船〉結束時的感傷筆調。誠然，在前往台灣的船上，他的寂寞與不安是強烈的。幸運的是，一位同船的年輕女性適時對他伸出友誼之手。而更

¹³ 請參閱呂紹理，〈日治時期台灣旅遊活動與地理景象的建構〉，收入黃克武主編，《畫中有話：近代中國的視覺表述與文化構圖》（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12月），頁294。

令人出乎意料的，他竟然在船上遇到一位同鄉。與這些人的邂逅，彷彿是在預言他的台灣之行還是受到祝福的。

不過，台灣風土的疾病意象，顯然讓中村印象深刻。收進《台灣小說集》的短篇小說〈在旅次中〉，最初發表於一九三四（昭和九）年五月的《行動》，屬於中村早期的創作，是一篇帶有淒美情調的作品¹⁴。這篇小說的女主角「俊」，最後就是因為感染熱病而死於台灣。〈在旅次中〉的情節是描寫主角分別在兩次的旅途中，與「俊」短暫交會的情分。主角當時是一位台北高等學校的日籍學生，可說是作者以自己為形象而塑造的人物。根據岡林稔的研究指出，日本文壇在明治末到大正時期，自然主義小說的創作技巧成為文學青年邁向作家之路的指標。當時許多知名作家在作品中將私人生活以藝術的告白的手法，對中村這些新生代作家是具有相當魅力的¹⁵。其實在佐藤春夫的舞台相關作品，就能輕易看到這種表現方式。而中村地平在《台灣小說集》中，也有多篇作品以此技巧展現。

〈在旅次中〉是主角對青春的追憶，其中也包含了他對「俊」的淡淡情愫。縱使如今已無法記起「俊」的真切容貌，但她的白皙身影與執著性格卻是他難以忘懷的。主角回想起與「俊」的初次會面，是某年夏天和友人牧一起到九州健行途中所認識的。「俊」當時在一個鄉村小鎮當小學老師，由於她和牧有親戚關係，所以計劃途經她的小學時叨擾住宿。不料學校當天有青年團的活動，於是「俊」轉而招待他們到旅館過夜。晚上三人聚在房間閒聊，就著窗口穿拂進來的涼風，主角感覺自己似乎被「俊」的浴衣飄散過來的香味所包圍住了。顯然主角對「俊」是頗有好感，然而他只是一位旅人，兩人的緣分或許是短暫的吧。怎知那年秋天，主角竟然在台北的東門市場裡瞥見「俊」的熟悉身影。向友人查證後才知道她已嫁到台灣的嘉義，這也開啟了他們在台灣交會的契機。

隔年寒假沒有回鄉的主角，計劃一個人沿台灣的西海岸旅行。在旅行途中來到嘉義，他決定順道拜訪「俊」。在尋訪「俊」的住處時，主角獨自走在本島

¹⁴ 中村地平，〈旅さきにて〉，《行動》，第2卷第5號，（1934（昭和9）年5月）。後收入《台灣小說集》，頁95-119。

¹⁵ 岡林稔，「南方文学」その光と影：中村地平試論（宮崎：鉦脈社，2002年），頁44。

人的街道上，由於種族的隔離性在這種鄉下更加明顯，他不僅受到異樣的眼光，骯髒汙穢的巷弄也讓他寸步難行。彷彿置身在奇異的時空，強烈的疲憊與不安在找到「俊」後才稍稍平息。兩人在異鄉重逢是值得喜悅的，然而主角也察覺到她在此地的處境是落寞的。縱使有丈夫的陪伴，但在日本人稀少的嘉義鄉下，「俊」終須長期忍受孤獨的煎熬。主角和他們夫妻分手之後，「俊」的故事卻還未告一段落。半年後，主角意外接到「俊」感染瘧疾而死亡的通知。「俊」的人生旅途，就在台灣劃下句點。不難發現小說裡所選擇的場景都「在旅途中」，如果人生是一場漫長的旅程，那麼主角和「俊」的交會只是沿途的短暫景點吧。

依循線性時間的進行，〈在旅次中〉呈現了相互對照的世界；兩趟旅途，兩個地理，兩種人生。死後安息在嘉義的「俊」，生前在她的心目中，台灣占有多少份量，讀者無從得知。曾向主角自白要採取獨身主義的「俊」，為什麼突然結婚，作者也沒有多加說明。因為「俊」的先生抱定海外雄飛的壯志，立志要往南方發展，所以她才會追隨而來到台灣。但是置身在台灣鄉下的「俊」，不僅要適應粗俗惡劣的環境，還要忍受孤獨與寂寥的心情。而主角在兩次旅途中和「俊」交會所激起的火花，最終也映襯了人間的無奈與蒼涼。「俊」如果沒有來台灣，必定會有不同的人生。台灣最終成了「俊」長眠的所在，她的死亡似乎是在叩問：「前往南方的可行性？」

然而青春的早逝，也籠罩著一種絕美情調。在死亡的恐懼意象之外，極有可能轉喻為浪漫的想像。在日本與台灣、文明與落後之間，「俊」之死在南方／台灣，作者的南方意象還有其辯證之處。縱使中村地平一直對南方懷有渴望，但是親臨與想像還是會有落差。他曾坦言雖然深受佐藤春夫的影響，但是隨著南方之行的漸近，也不免因種種臆測導致神經衰弱。對於熱帶的想像或是恐懼，其實都來自文明思維的訓練。透過中村另一篇作品〈廢港〉，相信可以更為理解中村的南方憧憬。〈廢港〉由兩篇作品組成，發表的時間稍早於〈在旅次中〉，也是中村初期的創作，是屬於紀行文式的短篇小說¹⁶。小說前半部「安平」，是

¹⁶ 中村地平，〈廢れた港〉，這篇作品是由兩篇文章〈廢港淡水〉與〈南海の紀〉組成，再以〈廢れた港〉為名收入《台灣小說集》，頁246-271。〈廢港淡水〉，原發表於《四人》，二月號，1932（昭和7）年2月，收入《台灣小說集》後標題改為「淡水」；〈南海の紀〉，

敘述主角——高校生和專攻植物學的大學教授夫妻，三人偕伴從阿里山旅行到南部的故事。後半部「淡水」，則是主角——高校生在前往淡水寫生途中，和一位內地來的畫家之間的對話。

前半部「安平」中人物的對話，可以觀察到旅者的跨文化想像與思鄉情懷。其中，植物學教授提出了他對台灣植物的分析：「已研究過這裡各形各色的植物，它們全都帶有強烈的性的魅力。」（頁 248）這位教授甚至以動物來比擬，認為亞熱帶植物在夜間所散發出來的氣息與姿態，如同動物的交歡。他的形容儘管很生動，卻不免帶有異色（erotic）的眼光。對植物學者而言，分析台灣植物的特色，也成為他詮釋台灣的方式。而少年高校生的心情，卻是把目光放在荒廢美的追尋之上。佐藤春夫在〈女誠扇綺譚〉中對荒廢風景與心境的營造，深深地影響了中村地平。藉由安平與淡水兩個廢港的荒廢意象的震撼，他也期待自我內在能激發出對人生嶄新的覺悟。在前半部「安平」到後半部「淡水」，其實都有這樣的中心思考。追求從荒廢到新生，甚至永恆的美，只有自然界才有如此搖撼人心的力量。因此作者不斷提到法國詩人莫泊桑在南方紀行的一段話：

總之，我就是看到了水、太陽、雲、岩石。——不幸詩人的幸福言語，幾度無意義地在我內心裡不斷地覆誦著。（頁 249）

對莫泊桑來說，他眼睛要捕捉的水、太陽、雲、岩石，就是最純粹的自然；不涉及文明的一切，只是對原始的渴望。如此單純的情感想必衝擊了中村地平的心靈，他嚮往南方也是為了追求這樣的蠻荒境界。中村在高校期間，就曾經因為神經衰弱的問題而留級一年。中村在此以法國詩人莫泊桑為借鏡，期待南方的光與熱能夠為他治癒精神上的苦惱。莫泊桑後半生為疾病所苦，視力衰退、偏頭痛、神經痛、全身麻痺與嚴重失眠，彷彿為了忘記疾病，他持續著寫作的熱情，而且也前往各地旅行，希望能藉此驅除病魔，他乘著遊艇倘佯於地中海，也不時造訪炙熱的非洲與南歐，然而在南方陽光的熱情照射下，終究還是無法燃燒掉他體內的病痛。莫泊桑最後的人生歲月，是在巴黎郊外的精神病院度過的。

原發表於《四人》，5月號，（1933（昭和8）年5月），收入《台灣小說集》後標題改為「安平」。）

以自然主義文學聞名的莫泊桑，其悲劇性的命運對中村產生無比的魅力。中村常在作品中引用莫泊桑在南方紀行的那段文字，應該也是希望這段話能夠帶給他力量吧。而他在少年時期所閱讀的佐藤春夫的台灣相關作品，則是對他形成積極影響的效用。當他透過回憶的文字，書寫自己初次的南方經驗時，可以看出兩位作家賦予他創作上的靈與肉。可以說，中村自少年期對南方的憧憬，是經由在台的高校生活而得以實踐，但是卻也留下了負面的回憶。中村提過和佐藤春夫初次會面時，台灣的事物是他們倆人共同的話題。在這次的對話中，中村向佐藤傾訴，在殖民地的生活並不愉快。佐藤則向他表示，這是因為政治等等原因所造成的¹⁷。中村在這裡並沒有詳述「不愉快」為何，但是顯然和佐藤春夫所解釋的理由有關。在〈廢港〉後半部「淡水」的人物對話中，也曾討論日本人是否能以人道主義看待殖民地的問題，或者只是漠然以對¹⁸。由於民族的問題，政治的問題等等，這些複雜因素都有可能影響中村的台灣觀感。

當一九三九（昭和十四）年二月底，中村地平為了蒐集小說材料再度來台時，他已經成為一位專業作家，也發表過許多作品。除了寫作方面，距離他上次離開台灣到目前為止，這些年他的人生也有許多重大事件發生。首先，他和真杉靜枝的同居生活已將結束，兩人約定一起來台，卻是這段感情的終結之旅。而在此之前的一九三七（昭和十二）年五月，中村的大哥戰死在中國戰場，這個事件對中村的打擊相當大。同年的十月，他自己也收到徵召令而進入軍隊，不過後來因為胃病發作而立即退伍。但是隨著戰爭局勢的蔓延，日本全國也籠罩在風聲鶴唳的氣氛當中。中村決定在一九三九年到台灣取材，或許是希望能轉換心情而來的吧。從蒐集的材料來分析，他回歸原始、嚮往南方的渴望似乎更加強烈。然而在心境上，他終究還是無法逃避大時代的劇烈震盪。

中村地平這次的台灣之旅，受到總督府以內地文士的特殊身分而被招待，和佐藤春夫當時遊台的情況相同。他也透過這趟旅行，蒐集到不少寫作的題材。如果要具體說明中村再次造訪後的台灣觀感，〈旅人之眼——作家觀看下的台

¹⁷ 中村地平，〈佐藤春夫氏〉，《文藝》，1935（昭和10）年12月號，頁92。

¹⁸ 中村地平，〈廢れた港〉，頁263-264。

灣〉是相當重要的參考之作¹⁹。中村在這篇隨筆中，描述了他二度來台旅遊的見聞與心情。比起十年前就讀高校時的景況相比，他明顯感覺到台北已相當的現代化，不僅外在的事物改變了，連文化等精神層面的內容也有了急速的進步，這些變化令他相當驚訝。此外，他提到自己在台北停留只有一個目的，那就是去參觀台北帝大的土俗學教室，期待能瞭解「生蕃」的文化。中村也談到這次旅行受到官方相當的優遇，讓他非常感動。但是，來台過程中唯一使他無法忍受的，大概就是旅途中所遇到的本島人了。

中村在日本因為工作的關係，所以有很多旅行的機會，他又是一個極愛好庶民旅遊方式的人，所以在交通工具上都會選擇三等車廂。但是在台灣搭乘三等車廂，卻是一件必須忍耐的苦事。中村指出，除了車體本身的老舊、座位的不舒適之外，台灣人的衛生習慣還非常低劣。不僅隨地吐痰、大聲談話，還攜帶各種魚肉蔬果上車，因此整個車廂充斥著惡臭與喧嘩。而且台灣各地方的飲食店也都不注重衛生，他只好以香蕉充飢。這些因素終於讓久未復病的胃疾在途中發作。不難看出，這篇隨筆展現了近代旅者的文化心態，比起高校時期的青澀少年，此時的中村儼然已具備文明人的批判視野。

然而，中村在〈旅人之眼〉，還是對台灣沿途的景色讚歎不已，認為完全沒有令他失望。他甚至建議台灣應該規劃設立國家公園，將全台灣國家公園化。他的理由在於：

既然台灣是軍事、經濟的南進基地，那麼同時更必然是南進之人的慰安之地。(頁 63)

從這一段文字不難看出帝國的視線，中村提出要把台灣全島國家公園化，以成為南進者可以獲得撫慰的休憩之地。然而，台灣人的位置在哪裡？如果台灣是慰安之地，那麼台灣人所扮演的角色又是什麼？從他批判本島人的身段，到提議將台灣國家公園化，和他六、七年前在作品〈廢港〉中，苦心思索殖民地問題的文字，其間的書寫策略是有極大差異的。具體而言，對於台灣的南方風土

¹⁹ 中村地平，〈旅びとの眼—作家の觀た台灣〉，《台灣時報》，1939（昭和 14）年 5 月號。

特色，他的態度始終是憧憬的。他在另一篇隨筆〈台灣的溫泉〉也提到，在他高校時代時，就非常喜歡台灣的溫泉。台灣各地的溫泉，除了各有其天然特質之外，還能以極為便宜的價格享用，對中村這樣年輕的學生來說，真是非常快樂的事。因此他認為：「聽起來或許會誇張也說不定，但是我深深的感覺到，台灣真是旅行者的樂園。」²⁰從學生到作家，中村的社會身分已經轉換，然而他對南方的風土之情卻依舊未變。但是在批評本島人時，他所展現的文明視野則顯得非常敏銳。在〈旅人之眼〉的論述當中，台灣甚至能發展成帝國的新樂園，作者顯然提出他對南進政策的思考。這篇文章是他二度來台後不久就發表的，所傳達出來的南進觀點與台灣想像，應該是清晰而深刻的。中村的南方憧憬，也逐漸產生了變貌。

三、女性素描：跨種族想像

一九四一年（昭和十六）年所發行的《台灣小說集》，幾乎集合了中村地平在台灣書寫的短篇創作²¹。在為這本書所寫の後記，作者記錄下自己的南方志向：「對於南方的鄉愁、南方的憧憬、南方的愛戀，是我一生永不改變的事。」（頁 273）受到佐藤春夫的文學之啟發，中村展開了他的創作生涯，作品主題則都是以故鄉宮崎（南九州）或台灣的事物居多。從《台灣小說集》的選材方向來看，他相當偏愛台灣原住民的題材，並且帶有極為濃厚的南方色彩，這應該也和佐藤春夫的影響有關。佐藤的台灣相關作品，開啟了許多日人的殖民地想像，也引發文學者的南方憧憬，甚而成為日人作家在台灣書寫之上的典範。佐藤旅行台灣的初衷，是為了排遣個人感情生活所帶來的鬱悶情結，這和中村在某方面也是吻合的。中村少年時代在精神上的苦惱，乃至成為作家後與真杉靜枝的情愛糾葛，都激發他亟欲擺脫憂鬱的情緒，轉而追求南方風

²⁰ 中村地平，〈台灣的溫泉〉，《仕事机》（東京：筑摩書房，1941（昭和 16）年 3 月），頁 138。

²¹ 中村地平的台灣書寫，除了《台灣小說集》之外，他在 1933（昭和 8）年還發表了一篇改編自台灣原住民神話的童話〈白雲がなぜ窪地のうへに霞いてるか〉，《四人》，第 3 號。此外還有兩篇長篇小說：分別是〈長耳國漂流記〉《知性》，1940（昭和 15）年 12 月至 1941（昭和 16）年 5 月連載；《あをば若葉》（東京：博文館，1942（昭和 17）年）。

土的純真與熱情。〈熱帶柳的種子〉與〈蕃界之女〉，正足以鑑照他這兩個時期的南方憧憬。

中村在高校期間的文學活動已經相當活躍，他在總督府高等學校所刊行的校友會雜誌《翔風》、文藝部與繪畫部學友會刊《足跡》都有發表作品。但這些創作只能算是學生時代的習作，文學性並不高²²。〈熱帶柳的種子〉是中村地平正式踏入文壇的處女作²³，是他以高校時期的台北生活經驗為題材的青春小說。整部作品瀟灑著明亮、開朗的筆調，透過一位本島人少女阿恰的純真作風，描繪出主角在殖民地的生活面貌。

來到台灣念書的主角，和友人古賀在台北過著寄宿生活。本島人少女阿恰，是在主角的寄宿家庭中幫忙洗衣與打掃的工作。在主角的眼中，阿恰單純無邪的憨態，與這個家庭的女主人正好形成強烈的對比。由於男主人的長期出差未歸，這位女主人的身影始終籠罩著一股強烈的寂寞之情。而她的成熟與世故，正足以襯托出阿恰的天真與無知。阿恰是在兩歲的時候，被附近一戶人家買來當童養媳的。現年已經十七歲的阿恰，卻仍然未脫稚氣。阿恰與動物之間的相處，是作者極力鋪陳的部分；例如，阿恰曾經為了家中所飼養的母豬將在祭典中被宰殺，於祭典前夕不顧家人阻止而在豬欄陪那隻豬整晚。〈熱帶柳的種子〉會受到佐藤春夫的讚賞，主要原因應該是它展現了濃郁的台灣色彩。小說中登場的動物，或是作品的命名，以及文中出現的街景、木瓜樹，這些殖民地風情的素描，相信能夠喚起佐藤的台灣記憶與南方想像，這也印證了中村在書寫策略上的成功。

就像作者在第一段所描寫的，台北是很會下雨的地方。亞熱帶樹木的氣息，濃郁到在屋子裡也能輕易用手捉住。看不見的黃色花粉，在天空中飄浮著，走在人行道上，如指頭大的白色棉毛會落到身上，那是熱帶柳的種子。透過這些文字的敘述，可以感受到主角居住在台北的不真實感：

²² 關於中村地平在高校時期的文學活動，可參閱河原功著，莫素微譯，〈中村地平的台灣體驗——其作品與周邊〉，《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展開：與日本文學的接點》（台北：全華，2004年3月），頁24-32。至於中村在高校時期創作的評價，蜂矢宣朗和河原功都有論及。另參閱蜂矢宣朗，〈第二章：中村地平と台灣〉，《南方憧憬——佐藤春夫と中村地平》（台北：鴻儒堂，1991年），頁64。

²³ 中村地平，〈熱帶柳の種子〉，《作品》，1932年1月號。後收入《台灣小說集》（東京：墨水書房，1941（昭和16）年9月），頁143-158。

我總是會有天真地把這些棉毛放在掌中搓揉的癖好。住在殖民地的我們的心，往往會變得虛無吧。(頁 144)

這段形容台北潮濕氣候的文字，有顏色、有氣味、有心情。它間接說明了中村在殖民地的生活觀點。那是一種帶有距離的美感，迷離而浪漫。也是因為這層隔閡，所以閱讀〈熱帶柳的種子〉總是會有一種無法貼近台灣的筆調。在異國情調的視線下，這篇小說對台灣女性的觀察是有些偏頗的，尤其是童養媳阿怡的問題。在離主角住處不遠的本島人街上，色情行業相當盛行，許多少女也因此而被販賣到這裡。作者利用了妓女的淫賣生涯，映襯出童養媳阿怡的單純情懷。在主角看來，阿怡的童養媳身分無疑是幸運的，她和那戶人家的長子每天兩小無猜，將來正式結婚後必定能過著幸福的生活。但是，只要翻開日據時期的台灣女性史，就可以發現童養媳的命運和妓女是殊途同歸，她們的身體都是可以被買賣的²⁴。作者反而深化阿怡既無邪又無知的個性，藉由她對動物的愛情來刻劃善良的人性。

顯然，阿怡的童養媳形象被浪漫化了。她和動物間的互動，則展露出兒童般的稚情。在主角的心目中，無論是寄宿家庭的女主人，或是本島人街上的妓女，都更加突顯出阿怡的純潔色彩。日本學者岡林稔認為，綜觀中村地平所有作品，表面上一點也看不到民族主義的問題，〈熱帶柳的種子〉也是以阿怡的形象塑造為主。但是，這篇作品可以說是作者內心意識到民族主義的風潮，在佐藤春夫的文學影響下，傳達出自身對台灣憧憬的處女作²⁵。岡林稔的觀察，旨在肯定中村對殖民地的人道主義。筆者卻以為，這篇小說的浪漫主義與異國情趣，其實才是作品的主調。就像熱帶柳的種子抓在掌心的感覺，給人一種如夢似幻的虛無感。高校畢業後回到日本的中村，這或許是他回憶台北的心情吧。無論阿怡是否真有其人，她的鮮明性格也具體呈現了中村對本島女性的想像。

²⁴ 請參閱曾秋美，《台灣媳婦仔的生活世界》(台北：玉山社，1998年)。

²⁵ 請參閱岡林稔，〈中村地平と台灣小説：「熱帶柳の種子」について〉，「殖民主義與現代性的再檢討」國際學術研討會，中研院台史所籌備處、文建會主辦，2002年12月23、24日，頁10。

女性的素描，在《台灣小說集》是一大特色。如果說〈熱帶柳的種子〉的阿恰是漢人女性的代表，原住民女性則是〈蕃界之女〉的西巴魯·伊娃魯（シバル・イワル）²⁶。〈蕃界之女〉是中村在二度訪台後不久所創作的作品，可以說是他此趟旅行的成果之一。這篇小說一開始出現的風景，是在太魯閣峽谷。這是一部紀行文式的小說，中村在隨筆〈蕃界遊記〉中描述了到東海岸旅行的目的，是為了探訪「牡丹社事件」的經過²⁷。〈蕃界之女〉則是敘述兩名旅者在旅途中，結識一個原住民女性的故事。

在初秋的午後，為了驅除心情的鬱悶，主角三吉來到了花蓮。三吉的旅伴山名，則是前幾天在知本溫泉才初識的，是一位來台蒐集小說題材的作家。由於山名的慫恿，三吉決定和他一起前往花蓮的原住民部落。因為婚姻生活不協調而來到南方療傷的三吉，以及為了小說題材而來東岸尋訪的山名，兩人其實都是作者中村的分身²⁸。他們抵達花蓮後，在造訪原住民部落時遇到一位年輕的女性伊娃魯。因為感冒而沒有外出工作的伊娃魯，接受了三吉和山名兩人的請求，讓他們進屋內參觀。在薄暗的光線中，他們看到屋裡的簡單陳設與生活用品，進而對這些東西產生購買的興趣。伊娃魯熱情的招待他們，也積極和兩人做起買賣。當她認真地為三吉示範一條腰帶的綁法時，伊娃魯身上的汗味、體臭，以及屋子土地的氣息，全都撲進三吉的鼻子裡。同時他的手指在無意間，也觸碰到伊娃魯柔軟的乳房。三吉的胸口湧起一陣熱，身體也好像受到了震動，這種感覺就像是衰弱的體內吹進一股自然的生命力。本來已經對女性不再抱持

²⁶ 中村地平，〈蕃界の女〉，原發表於《文藝》，第7卷第9號，1939（昭和14）年9月。後收入《台灣小說集》（東京：墨水書房，1941（昭和16）年9月），頁199-244。

²⁷ 中村地平，〈蕃界遊記〉，《仕事机》（東京：筑摩書房，1941（昭和16）年3月），頁116-136。牡丹社事件肇始於1871年，有一艘琉球船隻在海上遭遇颱風，後來漂流到台灣的屏東縣滿州鄉附近。船上的琉球人上岸後，因不諳當地的民情而誤闖番社部落，導致有54人遭到殺害。幸運生還的12人，在漢人的幫助下平安返回琉球。日本當局得知這段經過後，藉口保護琉球居民，在1874年出兵台灣攻打番地。日軍5月在社寮登陸後，隨後與牡丹社人在石門爆發戰役。6月初再度動員兵力攻入牡丹社，終於迫使該社投降。軍事勝利後，日本向清朝採取強硬的外交政策，中日後來簽訂條約，承認日本出兵討伐番地的正當性，並且賠償日本軍事費用，日軍遂於12月撤軍台灣。這個經過被稱為牡丹社事件，也由於牡丹社事件的發生，引起清廷對台灣的重視。這個事件也可算是日本開始發展帝國主義的徵兆。

²⁸ 蜂矢宣朗，《南方憧憬——佐藤春夫と中村地平》（台北：鴻儒堂，1991年），頁92。

希望的三吉，彷彿從伊娃魯身上得到了復甦的生氣。文明往往壓抑了人性本能，因此在接觸原始氣息的同時，也讓三吉體內產生了生理變化。在此之前，三吉的女性觀是悲哀的，這也頗能反映出作者在情感上受挫的情緒，因為中村地平與女作家真杉靜枝（1901～1955）的感情生活，為他帶來了許多苦惱²⁹。中村在小說開頭再度引用了莫泊桑的話，藉此道出前往南方的心情：

總之，我就是看到了水、太陽、雲、岩石。——除此以外的事無法言說。
——而我僅僅只是想到了人在水波中搖晃而睏倦想睡、甚至被波浪推動時總會想到的事。（頁 201-202）

期待投向自然的懷抱，以治癒身體或精神的創傷，是莫泊桑能夠引起中村共鳴的地方。因為伊娃魯而得到慰藉的三吉，甚至在夢中也看見她的身影。出現在夢中的伊娃魯，融入了三吉在幾天前從知本溫泉眺望到的景象。在一塊大岩石的蔭下，有兩個原住民女性在泉裡泡湯，似乎是一對祖孫。年輕的女孩，把兩手當作枕頭，放心地將上半身靠在岩石邊仰睡，她那對豐滿的大乳房，就赤裸裸的浮現在泉面上。這一個畫面，是中村地平親眼目睹的場景，而把它寫進小說中。他的散文〈蕃界游記〉，也曾描述過這個令他屏息感動的一幕³⁰。在〈蕃界之女〉的內容中，這段回憶不僅成為主角三吉的旅遇，也化身為他夢中的景物，甚且和伊娃魯的形象做了巧妙的結合。

和伊娃魯邂逅後，三吉重新感受到身心的甦醒，他和山名也進而思考文明與野蠻的問題。他們在旅行途中，知道台灣的外島蘭嶼還有雅美族的存在。有一群原住民維持著天地開闢以來的生活方式，而這個小島竟然就在日本附近，這是令人驚奇的事情。已經捲入二十世紀文明漩渦的日本，對於雅美族人的文化想必無法想像，但僅僅只是知悉他們的生存之道，也會讓三吉這種厭倦都會

²⁹ 中村地平和女作家真杉靜枝的交往，是在 1934（昭和 7）年開始。關於中村地平和真杉靜枝之間的情感糾葛，以及對他創作的影響，岡林稔在他的專著中有詳細的分析，請參閱氏著，「南方文学」その光と影：中村地平試論（宮崎：鉦脈社，2002 年）。尤其是第二章的第三節「真杉靜枝とのこと」，頁 75-79。

³⁰ 中村地平，〈蕃界遊記〉，《仕事机》（東京：筑摩書房，1941（昭和 16）年 3 月），頁 136。

生活的文明人，轉而憧憬原始人的素樸世界。然而三吉和山名也注意到台灣本土的原住民，其實已經開始朝向現代化。在理蕃政策的推行下，他們的維生方式，從傳統的狩獵轉向定點農耕。在許多部落裡，也出現像內地日本人農家的改良式住宅。受到文明恩澤的原住民，他們在生活方式甚至在思維上的轉變，到底是幸福，還是不幸？作者透過三吉發出這樣的疑惑，也展現了批判現代性／殖民性的思維。阮文雅指出，中村地平在〈蕃界之女〉中對台灣原住民的境遇，表達了「自省」的態度。³¹然而，原住民是無力選擇屬於自己的幸福之道的。在文明與野性之間，它的界線往往取決於文明者的眼光。當文明以殖民主義的力量入侵原住民部落時，它也成為帝國的面具。

透過伊娃魯的形象，可以理解他這段時期的南方憧憬，縱使帶有浪漫的想像，但已經投射了現代性的文化視域。不難發現，中村在一九三九（昭和十四）年來台後的創作，幾乎集中在台灣原住民書寫，這應該是他這個階段的文學方向。除了先前提到兩位作家莫泊桑與佐藤春夫對他的影響之外，也和此行他能以內地文士的身分而接觸到許多原住民資料有關。具體來說，他的早期作品〈熱帶柳的種子〉、〈在旅次中〉所流淌的南方色彩，確實是較為直接的風景與心境素描。而二度訪台後的發表作，在題材上則明顯以原住民主題為觀察對象。根據岡林稔的研究指出，他認為中村從〈蕃界之女〉到後來創作〈霧之蕃社〉，這兩篇作品才較為明確地呈現出文明與野蠻的主題³²。不過這個觀點似乎還有待商榷，因為在〈蕃人姑娘〉中也有這樣的文化思維。

根據岡林稔的分類，他將〈蕃人姑娘〉和〈熱帶柳的種子〉、〈在旅次中〉三篇，歸類為中村初期帶有浪漫主義象徵的作品³³。由於〈蕃人姑娘〉沒有發

³¹ 請參閱阮文雅，〈中村地平「蕃界の女」と佐藤春夫「旅びと」——作品における「南方憧憬」のまなざしを巡って〉，2005年日語教學國際會議論文集，東吳大學日本語文學系主辦，2005年，頁233-249。

³² 請參閱岡林稔，「南方文學」その光と影：中村地平試論（宮崎：鈺脈社，2002年），頁125。除了一些日本學者的單篇論文之外，岡林稔可以說是近年來在日本對於中村地平的南方文學進行系統性研究並有專書出版的學者。另外，〈霧の蕃社〉，原先發表於《文學界》，1939（昭和14）年12月號。後收入由河原功監修，中村地平著，《台灣小說集》，（日本殖民地文學精選集17；〔台灣編8〕）（東京都：ゆまに書房，2000年9月），頁1-66。〈蕃界の女〉和〈霧の蕃社〉都是中村在1939（昭和14）年訪台後完成的創作。

³³ 中村地平，〈蕃人の娘〉，原收入《蕃界の女》（初出誌不明）（東京：新潮社，1940（昭

表在任何刊物，而是直接收入中村的小說集當中，所以無法確知寫作的完成時間。〈蕃人姑娘〉是一篇頗為特殊的小說，它雖然是以原住民女性為主題，場景卻在中村年少時期居住過的殖民地都市台北。歷來有關中村地平的文學研究中，這篇小說顯然不受重視。但是筆者認為，透過中村在〈蕃人姑娘〉的書寫策略，可以釐清中村後期作品的中心思考。這篇小說的篇幅不長，是描寫來到台灣唸書的主角，和鄰居山本一家人的互動情形。以第一人稱的表現技法來看，〈蕃人姑娘〉確實具有中村早期創作的特質。然而它所涉及的內涵，亦即文明與野蠻的議題，卻是可以置放在〈蕃界之女〉、〈霧之蕃社〉，甚至是後來的長篇小說《長耳國漂流記》這一條軸線來探討的³⁴。

〈蕃人姑娘〉的故事，從主角和鄰居山本先生的同鄉情誼說起。由於兩人的故鄉都在日本九州，因此他們開始認識後就變得很親密。山本先生是一位退休的警察官吏，如今和太太過著安樂的晚年生活。為人和氣、沉靜的山本，在主角到他家拜訪時，都會聊起往日當巡查時討伐生蕃、土匪的事情。在這個家裡還有一位女傭花子，是一位二十多歲，溫柔、寡言的女孩。作者還特別描寫了花子的眼睛；她的眼睛銳利的令人感到是位個性好勝的女孩，但是眼睛的色澤卻相當深澄，足以彌補好勝的缺點。在主角看來，花子的舉止，其實相當具有女性含蓄的特質，每當主角到山本家叨擾時，她總是在送完茶點後就害羞的躲起來。如果不是山本太太自己提出，主角絕對看不出花子是一個原住民姑娘。因為花子的外表裝扮，和內地姑娘可說是完全沒有兩樣。因此主角在聽到這個事實後，覺得實在不可思議。

花子其實是一位十分日本化的原住民少女。山本先生之前派駐在花蓮工作，他的太太感染到熱病，花子就是當時的看護婦。受到花子無微不至的照顧，

和 15) 年 5 月)。後收入《台灣小說集》(東京：墨水書房，1941 (昭和 16) 年 9 月)，頁 67-76。岡林稔的研究指出，依照中村在高校時期的同學長嶺宏的說法，〈蕃人の娘〉是作者描寫青春時期淡淡戀情的作品，這篇小說和〈熱帶柳の種子〉、〈旅さきにて〉，都是屬於中村初期帶有浪漫主義象徵的創作。請參閱岡林稔，〈中村地平『台灣小說集』解説〉，收入河原功監修，中村地平著，《台灣小說集》，(日本植民地文學精選集 17；〔台灣編 8〕)(東京都：ゆまに書房，2000 年 9 月)，頁 3。

³⁴ 中村地平，《長耳國漂流記》(東京：河出書房，1941 年 6 月)。這部長篇作品是描寫牡丹社事件的始末，以及後來日本派遣西鄉從道到台灣征伐的經過。

彼此間也建立了親密的感情，所以後來山本夫婦要離開花蓮到台北時，就讓花子也跟隨他們到至今。山本先生對台灣原住民始終抱持著善意的態度，這也是他會接納花子的原因。可是主角對於原住民還是懷有疑慮，他直接向山本先生詢問：「不是時常有內地人在蕃界被殺害的事情嗎？」（頁 72）其實，中村地平高校畢業回日本那一年，台灣爆發了震驚的「霧社事件」。事變的鎮壓行動結束後，總督府針對此事所完成的調查報告與官方檔案，還是將霧社事件的責任歸因於「兇蕃」的野性。這段歷史相信對中村也造成極大的衝擊，他後來會以霧社事件為題材寫成〈霧之蕃社〉，其實在〈蕃人姑娘〉這篇小說中，已經可以感受到他對這個事件的注目。

在獲知花子的原住民身分後，主角開始以另一種眼神來凝視她；花子豐滿而健康的肉體，彷彿從體內深處洋溢著野性的氣味，那是一種極具彈力的美感。然而，她眼神的銳氣似乎更暗沉了，散發出在深山居住的原始人般的激烈凶暴的熱情。主角不禁想像，她的成熟肉體，就好像長在樹上的一顆成熟果實，但卻是在伸手也無法觸及的深山樹林裡。花子的野性美，顯然具有肉體的吸引力與凶暴的威脅力。在文明人的思維中，野性往往影射了強大的肉體慾望。主角心中不斷描繪的身影，其實也是作者對野性的渴望。在那之後，主角一直沒有和花子近距離接觸的機會。當秋天來臨時，山本夫婦突然決定要回日本定居，卻無法帶花子隨行。在出發那一天，花子為了盡情宣洩巨大的悲傷，發出如孩童一般的哭聲，後來她甚至做出了令人驚訝的舉動，企圖用身體去阻止火車前進。如何也想要一起去內地的心意，終於隨著火車漸行漸遠而絕望。

花子的形象，在這篇小說中呈現了三種的劇變。從完全日本化的花子，到極具成熟野性美的花子，以及小說結尾時以兒童姿態收場的花子，這三個類型是極端對比的，卻同時存在於花子身上。在文明與野蠻之間，作者似乎抱持著一種宿命觀。縱使花子接受日本文化的啟蒙，擁有辨識不出種族身分的外貌，然而她血液中流淌的野性，還是無法改變的宿命。當主角獲悉她的原住民血統後，開始以異國情調的視線，對她產生異色的幻想。最後，花子在車站上任性的一幕，是這篇小說的高潮，也戲劇性的點出花子的內在性格。這篇作品有作者對於野性的渴望，卻是以文明人的憧憬為出發點的。岡林稔認為從〈蕃界之

女〉開始，中村在作品中才較為明確地去呈現文明與野蠻的主題。他將〈蕃人姑娘〉視為中村對青春期的思慕作品，但是並未加以詮釋。〈蕃人姑娘〉也是《台灣小說集》當中，最被研究者忽略的一篇作品。然而筆者以為，要探討中村的台灣種族想像，以及他在南方文學志向的發展軌跡，〈蕃人姑娘〉是相當重要的作品。它已經處理到文明與原始的糾葛，也涉及了殖民性與現代性的內涵，藉由〈蕃人姑娘〉的文本脈絡，也更有助於釐清中村一系列的台灣原住民書寫。

四、歷史的紀實與虛構

中村地平在一九三九（昭和十四）年來台旅行時，因緣際會認識了出動鎮壓霧社事件的台中州知事水越幸一，從他口中得知霧社事件的始末，並據此整理而寫成小說〈霧之蕃社〉³⁵。發表於一九三九（昭和十四）年十二月號《文學界》的〈霧之蕃社〉，也是第一篇直接以霧社事件為主題的小說³⁶。中村此行在台灣停留了一個月的時間，有十四天在台北度過，其餘十六天則環島一周。中村曾在〈旅人之眼〉中提及他在台北停留只有一個目的，那就是去參觀台北帝大的土俗學教室，期待能瞭解「生蕃」的文化。而在另一篇隨筆〈蕃界游記〉，則描寫了他前往台灣南端鵝鑾鼻探訪牡丹社事件的遺蹟³⁷。從這些文章看來，中村在出發來台前，就已經計劃要蒐集原住民資料做為寫作題材。除了水越幸一提供他資料之外，中村也從台北帝大史學教授與總督府圖書館長的談話中獲得許多協助³⁸。

從中村取材的對象來判斷，〈霧之蕃社〉的敘事觀點幾乎複製了總督府所發表的官方資料，其中的多數情節更摻雜了作者的原住民想像。因為作者在這篇小說中，對於霧社事件的領導者莫那·魯道，運用了大量的篇幅來呈現他的負

³⁵ 中村地平，〈旅びとの眼——作家の見た台灣〉，《台灣時報》，1939（昭和14）年5月號，頁64。

³⁶ 河原功著，莫素微譯，〈中村地平的台灣體驗——其作品與周邊〉，《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展開：與日本文學的接點》（台北：全華，2004年3月），頁39。

³⁷ 中村地平，〈蕃界遊記〉，《仕事机》（東京：筑摩書房，1941（昭和16）年3月），頁121。

³⁸ 同上註，頁125。

面形象。另一方面，卻對花岡一郎參與起義的史實避重就輕，而刻意形塑他自殺前所展現的日本武士精神。這些角色的安排，和官方報告幾乎完全吻合。〈霧之蕃社〉編寫自歷史事件，顯然和中村其他的台灣體驗作品有所不同。參考水越幸一和官方檔案所寫成的〈霧之蕃社〉，不難看出是一部偏離歷史事實的小說。小說的情節發展，不僅將暴動的罪過推諉於高山族的野蠻本性，也企圖淡化統治者對蕃人勞力剝削與歧視待遇的問題。讓我們進入文本脈絡來分析，將會更加理解作者的再現方式。

〈霧之蕃社〉有幾位主要的人物，原住民方面是接受殖民者栽培的花岡一郎、二郎，事變主導者莫那·魯道及他的妹妹特娃絲·魯道，還有三名主要參與事變的皮和·沙茲波、皮和·瓦利斯、泰莫·和茲庫。至於日本人方面，有掌握蕃人出役薪資的佐塚愛佑警部，在族人婚禮上和莫那·魯道之子起衝突的吉村克己巡查，以及娶莫那·魯道之妹卻又遺棄她的近藤儀三郎巡查。從這些出場人物，可以推測作者把當時官方歸納出「霧社事件」發生的原因都寫入小說：第一是蕃人出役遭到剝削的問題，第二是理蕃警察和原住民女子通婚的問題，第三是莫那·魯道未脫凶蠻本性的問題³⁹。中村在〈霧之蕃社〉確實掌握了當時原住民在殖民統治下的生活處境，阮斐娜在她的專書中也指出中村的書寫策略呈現了作者對台灣原住民的同理心⁴⁰。然而，中村所選擇的官方材料，卻削弱了同情的目光。

對於花岡一郎、二郎的形象，〈霧之蕃社〉並不多所著墨。但是，中村卻選擇在小說開頭，描述了一郎在運動會前夕的心理掙扎；關於明日的事變行動，他顯然不知所措。他不可以背叛族人的計畫，但是日本人對自己卻有再造之情。陷入兩難的一郎，在事變後終於選擇自盡。小說特別強調了花岡一郎身穿和服、切腹自殺的和魂精神，這一點也和殖民者對外發布的消息相吻合；他的自殺畫面就像是一場懺悔儀式，至少可以稍稍減緩日本人在面對事變的狼狽與尷尬。

³⁹ 橋木白水，《あ、霧社事件》（台北：南國出版協會，1930（昭和5）年12月）。本文引用之復刻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99年6月初版），頁110-111。

⁴⁰ 請參閱 Faye Yuan Kleeman（阮斐娜），*Under an Imperial Sun: Japanese colonial Literature of Taiwan and the South*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3), 頁26-34.

中村低調處理花岡一郎、二郎在事變中的位置，而把焦點置放在蕃人暴動的非理性層面。尤其是在霧社事件領導人莫那·魯道的刻劃，以及三名主要參與事變的皮和·沙茲波、皮和·瓦利斯、泰莫·和茲庫，在小說的書寫策略採取了貶抑的呈現方式。就如同官方檔案對蕃人的定義：「平常如貓的他們一旦見到流血的慘狀，可能立即失去理智，潛意識在剎那間燃起，相貌馬上變得可怕，行為又敏速，根本不是普通人所能想像。」⁴¹透過官方的論述，嗜血性與野蠻性成為原住民的共同特質。作者把莫那·魯道形容成狡猾、兇猛的蕃社頭目，三名主要參與事變的蕃人則是在生活中受到挫折，又被蕃社族人唾棄的滋事分子。由這些人所主導的霧社事件，自然是一起「兇蕃」不服教化的叛亂事件。

莫那·魯道對日本人的仇恨，除了在出役問題上有所埋怨，他的妹妹嫁給日本巡查近藤儀三郎，旋即又遭到拋棄，也是他心中的一大恨事。理蕃警察對原住民女性始亂終棄的事，在日據時期的理蕃史上屢見不鮮。和親政策本來是為了輔助理蕃事業的推展，卻演變成日本官吏在蕃地排遣寂寞的替代方式。作者反而採取了逆向思考，認為蕃女都很期待成為日本官吏的妻子：「蕃女對於內地人的男性充滿憧憬，這是從以前到現在都一樣的事。」⁴²尤其向特娃絲·魯道求婚的人，不是普通男性而是日本巡查，更是令她相當得意。雖然特娃絲·魯道對結婚一事的興致相當高，但是部落的習俗並不歡迎族人和別的種族通婚，莫那·魯道身為頭目更不應該破壞這種風氣，因此他的心情顯得相當猶豫：

如果特娃絲成為近藤巡查的妻子，那我就是大人（註：日據時期對警察的敬稱）的兄長了。內心被這樣的誘惑牽引著，莫那·魯道是苦惱的。（頁 12）

中村刻意突顯莫那·魯道對於權勢的誘惑，後來他的妹妹也如願嫁給近藤巡查。然而婚後生活種種的不協調，終於導致近藤的不告而別。但是小說裡的情境無

⁴¹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霧社事件誌》，（台灣總督府警務局，油印）部外密。本文引用之復刻本係由戴國輝編，魏廷朝譯，《台灣霧社蜂起事件：研究與資料》（下冊）（台北：遠流、南天共同出版發行，2002年4月），頁501。

⁴² 中村地平，〈霧の蕃社〉，《台灣小說集》（東京：墨水書房，1941（昭和16）年9月），頁11。本文引用之復刻本係由河原功監修，《台灣小說集》，（日本殖民地文學精選集17；〔台灣編8〕）（東京都：ゆまに書房，2000年9月）。

疑是同情近藤儀三郎的，這在〈霧之蕃社〉是一個很明顯的書寫策略。作者對於理蕃官吏的描述都是正面的，包括在原住民婚禮上和莫那·魯道的兒子起衝突的吉村巡查，他們在小說裡都是善良、溫和、負責的警察。至於掌管蕃人出役薪資的佐塚警部，在官方史料裡他確實有所疏失，但是這篇小說卻把薪資問題所引發的抱怨，歸罪到部落中一些不良分子的煽動。從這一點可以明顯看出，小說甚至超出了史料的觀點，而比統治者的立場更泛政治化。這篇作品在最後片段，還出現了台中州事水越幸一的事蹟，描述他領隊到山區搜尋暴動蕃人的一幕：

知事水越幸一也領隊在全山搜索，當他眺望到深林之中蕃婦和小孩上吊的屍體時，意外地升起悲哀地感動。他們大部分的人都為了自盡而裝扮自己，幾乎全部穿上了內地人的和服。這些和服都是水越知事本人為了撫育蕃人，在不久前的同一年春天用貨車運來送給他們的物品。(頁 66)

作者在小說的結尾，加上這一段動人的描述，或許是想要感謝提供他寫作資料的水越幸一吧。水越幸一確實有領隊上山搜索蕃人，但是在官方資料中並沒有記載上述的畫面。這也許是作者自己的想像，也可能得自水越幸一的說法。中村利用史料所完成的〈霧之蕃社〉，誠然沒有脫離官方論述的框架。他複製了官方的意識形態，在書寫策略上彰顯蕃人的野性，卻低調處理統治者的不當政策。曾經讓作者怦然心動的「野性」，一旦覆蓋上暴力的陰影時，也成為被賤斥的對象。從〈霧之蕃社〉的再現政治來對照霧社事件，不難釐清作者的意識形態與虛構的歷史想像。

對於〈霧之蕃社〉的評價，日本學者尾崎秀樹是以「異國情調」的視角來定義：「對於從那時就開始發表習作的他來說，南方熱帶的景物是寄託情懷的極好素材。從這個意義上來講莫那·魯道也好，他的長子達達鄂·魯道也好，都只不過是作者藉異國素材寄託鄉愁、寄託對南方熱帶的憧憬與熱愛的素材而已。由於樂觀地描寫了以莫那·魯道為首的高山生活狀態，所以有給讀者一個

與專制統治者想像中的殘忍至極的高山族完全不同的印象，這確是事實。」⁴³這樣的說法，顯然忽視了作者對於原住民殘暴野性的書寫策略。〈霧之蕃社〉確實具備濃厚的異國情調，但是同時也涉及了日本人被殺的史實。中村的用意並非是樂觀地描寫出以莫那·魯道為首的高山生活狀態，而是深化原住民非理性的層面，霧社事件想必衝擊了中村的南方憧憬。

日本學者河原功對〈霧之蕃社〉的評論則是較為持平的：「先不論這個事件有沒有小說化的魅力，起碼都還沒有人十分正式地描述過這個事件，這也是由於此事被當局有心地矇蔽了真相，對於霧社事件的認識，人們也多依賴報導與總督府所發表的〈霧社事件之始末〉，於是，他所寫的〈霧之蕃社〉也並沒有脫離了官方說法的框架……更重要的是他以統治者的姿態來看這件事，自然無法迫近理蕃政策的問題本質。」⁴⁴河原功站在為中村辯護的立場，認為他完全採用官方的史料，才會無法釐清事變的真相。如果作者能訪問到參與事變的原住民，那書寫的立場又是會如何？誠然，直接參與霧社事件的原住民已無人存活下來，因此這個假設自然無法成立。但是，他曾經為了另一篇小說〈長耳國漂流記〉，訪問到與牡丹社事件有關的原住民，卻懷疑對方是否會把史實與現實混淆不清⁴⁵。中村面對原住民的態度，也許是一種政治無意識（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這也足以說明為什麼他會接受官方的觀點。在文明與野蠻之間，對於不具有現代視野與歷史意識的原住民，象徵理性的殖民者才是足以信賴的。

《長耳國漂流記》（東京：河出書房，一九四一年六月發行）以單行本出版，是描寫牡丹社事件的始末。日本學者山路勝彥在研究中指出，牡丹社事件發生之後，日本的新聞媒體頻繁報導這個事件的始末。由於日本人對於台灣的原住民完全不了解，因此報導的內容取向也左右了日本人的台灣認識。經由那些報導的文字，台灣的住民被賦予「野蠻」、「食人」等概括的觀念。

⁴³ 尾崎秀樹，《舊殖民地文學の研究》（東京：勁草書房，1971年6月）。本書之中文版為陸平舟、間ふさ子共譯，《舊殖民地文學的研究》（台北：人間出版社，2004年12月），頁232-233。

⁴⁴ 河原功著，莫素微譯，〈日本文學中的霧社事件〉，《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展開：與日本文學的接點》（台北：全華，2004年3月），頁80-81。

⁴⁵ 中村地平，〈蕃界遊記〉，《仕事机》（東京：筑摩書房，1941（昭和16）年3月），頁124。

在地理上，「南洋」的「未開化」也成為日本人形塑南方的意象。⁴⁶中村第二次來台的主要目的，就是採集這個事件的史料。牡丹社事件後的出兵討伐被視為是日本展開帝國主義的濫觴，中村會用何種方式呈現，其實並不難想像。以野性和宣撫為主題的《長耳國漂流記》，也在於宣示殖民與開化原住民的合理性。《長耳國漂流記》是一部長篇小說，並未收入《台灣小說集》，在篇幅與主題的限定範圍之下，筆者計畫另文探討這部作品。在此提出《長耳國漂流記》是想輔助說明，中村在這個時期的南方書寫，開始以小說詮釋台灣歷史，進而呈現南方的蠻荒待開性格。

尾崎秀樹認為中村的《台灣小說集》雖然是以台灣為題材，但是從大部分描寫的都是蕃地傳說事件這一點來看，不難想像對中村而言，台灣乃是一個敘事詩般的世界。⁴⁷他會提出這樣的觀點，是因為《台灣小說集》中有三篇關於原住民神話傳說的作品：〈人類創世〉、〈太陽之眼〉、〈太陽征伐〉，是中村參考由總督府編纂、佐山融吉與大西吉壽所蒐集的原住民傳說《蕃族舊慣調查報告書》而完成的。中村自己說過，這三篇作品不是單純的創作，也並非純正的傳說，而是透過佐杉、大西所收集到的故事，再混合他自己的一些幻想而完成的⁴⁸。這樣的書寫企圖是龐大的，因為三篇作品涉及了二十幾個傳說。藉由日本人類學者的調查下，台灣原住民的神話傳說以文字方式被記錄下來，透過中村的想像再進行創作，他的作品已非原住民神話傳說的原型，而是經過兩次再詮釋的結果。敘事詩般的神話世界，顯然是尾崎秀樹在閱讀後的印象。然而《台灣小說集》所展現的歷史想像，絕對不只是浪漫主義和異國情調而已。當〈霧之蕃社〉成為再現霧社事件的歷史小說時，作者對霧社事件的詮釋已非個人的意識形態，而是選擇性接受官方史料的結果，〈霧之蕃社〉也成為殖民者形塑原住民的帝國文本。

⁴⁶ 山路勝彦，《台灣的殖民地統治——〈無主の野蛮人〉という言説の展開》（東京：日本図書センター，2004年1月），頁34-35。

⁴⁷ 尾崎秀樹著，陸平舟、間ふさ子共譯，《舊殖民地文學的研究》（台北：人間出版社，2004年12月），頁233。

⁴⁸ 中村地平，〈太陽征伐〉，《台灣小說集》，頁160。中村在文章中所提到的《蕃族舊慣調查報告書》（台北：台灣臨時舊慣調查會，1913-1921年），關於原住民傳說的部分是由兩位人類學者佐杉融吉和大西吉壽所蒐集的。

五、結語

中村不只一次表示，他的南方之行與台灣書寫，都得自佐藤春夫的啟發。而另一位法國作家莫泊桑，也是指引他在南方想像上的重要人物。莫泊桑對原始的渴望，撼動了中村地平的心靈，在西方世界開始對都市文明展開批判時，回歸自然成為許多文明人的嚮往。當西方文學中的南方論述旅行到日本後，就影響了像中村地平這樣的作家。誠如莫泊桑的南方紀行，營造出印象式的情感，讓中村對蠻荒世界產生了直接的憧憬。而佐藤春夫的台灣紀行，則提供中村一個實踐南方體驗的模式，成為他在殖民地的旅行導覽書。中村在創作中一再出現的原住民主題，顯然深受佐藤春夫的影響，他們書寫台灣的方式，都在於突顯地域特色與南方風土，除了野性的憧憬之外，也和強烈的異國情調有關。不過以中村在台北的生活經驗和後來的取材之旅，顯然和佐藤春夫的短暫旅行不同。不難看出，中村在戰爭期的台灣書寫，縱然在取材方面和佐藤有很大的同質性，但是書寫策略已呈現明顯的差異。

誠然，中村早期對南方／台灣的鄉愁，其實是懷抱了鮮烈的浪漫主義。但是在二度訪台後，他的觀察視域，開始聚焦在台灣原住民族群。透過題材的選擇，他的《台灣小說集》也展現了野性的原住民想像。曾經直言在殖民地生活不愉快的中村，後來卻提出要把台灣設為國家公園的構想，因為它能撫慰南進之人的身心。為什麼中村會出現轉折性的思考，還是必須置放在大時代的氛圍中探討。一九三七（昭和十二）年五月，中村的大哥戰死在中國戰場，這個事件對中村的打擊是相當大的。同年十月，他自己也收到徵召令而進入軍隊，不過後來因為胃病發作而立即退伍。但是隨著戰爭局勢的蔓延，日本全國也籠罩在風聲鶴唳的氣氛之中。當時的台灣總督小林躋造（1877～1962），為了因應戰局而在台推動皇民化運動，提出治台方針為「工業化、皇民化、南進基地化」⁴⁹。日本冀望以台灣做為南進基地，進攻中國華南與南洋群島，從而建立大東亞共

⁴⁹ 小林躋造為台灣在日據時期的第十七任總督，任期從1936（昭和11）年9月至1940（昭和15）年11月。出身海軍大將的小林躋造，屬於皇民化時期被派任來台的武官總督。請參閱黃昭堂，《台灣總督府》（台北：鴻儒堂，2003年8月），頁160-169。

榮圈⁵⁰。中村在〈旅人之眼〉中的發言，不難看出南進政策對他引發的效用。從中村在一九三九（昭和十四）年蒐集到的材料來分析，他回歸原始、嚮往南方的渴望似乎更加強烈，卻也終究無法逃避外在世界的劇烈震盪。一九四一（昭和十六）年他再度接受徵兵，被派遣到南洋從軍。中村對於南方憧憬的地理版圖與文學創作，也隨之擴張到馬來半島。從而，他的作品內涵也超出了佐藤春夫的影響。

中村在一九三九（昭和十四）年以降的創作，可以逐漸感受到南進政策的影響。文明與野性的相剋與否，是他在作品中不斷辯證的問題。從厭倦文明的近代人想回歸原始的渴望，到呼應日本南進政策而提出南方憧憬，中村的《台灣小說集》不僅展現了近代人的文化視域，也帶出了帝國的慾望。中村在小說集的「後記」所寫下的文字：「對於南方的鄉愁、南方的憧憬、南方的愛戀，是我一生永不改變的事。」（頁 273）其中對於南方的執著，顯然是一種帝國的慾望及其膨脹。就文學性來討論，在《台灣小說集》的各篇作品中，他的台灣體驗作品如〈熱帶柳的種子〉、〈廢港〉、〈在旅次中〉、甚至是〈蕃界之女〉，無疑都優於歷史小說〈霧之蕃社〉。透過官方資料而完成的〈霧之蕃社〉，在歷史的紀實與虛構之間，中村選擇代表理性的殖民者這一邊，而忽視歷史被遮蔽的部分。可以說，他的南方文學在〈霧之蕃社〉發表後，至此展開一個新的變貌階段。

霧社事件衝擊了中村的南方憧憬，促使他開始以小說來詮釋殖民地的歷史，他的南方想像也逐漸和日本帝國主義的南進政策進行了巧妙的結合。從嚮往南方的蠻荒未開化，到強調南方的蠻荒待開化，南方作為一個概念，其實是一種政治無意識（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的表徵。以日本為中心的地理觀，形塑了中村的南方想像。而中村地平的南方文學，也成為帝國書寫的一環，無形中展開了認識南方的知識論。南方象徵與日本地理相對的蠻荒位置，南方是有待被文明開發的區域。在中村的台灣相關作品中，南方與蠻荒，變成可以互相指涉的對象；南方充滿蠻荒的意象，蠻荒的所指就在南方。《台灣小說集》的

⁵⁰ 矢野暢，〈「南進」の系譜〉（東京都：中央公論社，1997年6月）。

台灣觀點，從對自然野性的憧憬到凶暴野性的賤斥，中村的南方文學與台灣種族想像，終究還是無可避免地和殖民論述產生了某種共謀。

